

● 现代语言学丛书

汉语现代音韵学

● 杨剑桥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汉语现代音韵学

杨剑桥 著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99 000

版 次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2 001—5 000

书 号 ISBN7-309-01625-4/H·269

定 价 1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汉语音韵学可以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两大阶段,传统的阶段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到清代乾嘉学派和章炳麟、黄侃为止,现代的阶段是从高本汉、马伯乐开始,一直到当代的国际国内诸多大师为止,而实事求是地说,现代阶段的内容比起传统阶段来,显得更为科学,更为重要,也更为精彩。当然,这里两大阶段的划分,是根据整个音韵学科的发展趋势来确定的,并不是说,凡是高本汉、马伯乐以后的研究和著述都属于“现代的”范畴。因为直到今天,只信从传统的学问的仍然大有人在,他们的研究和著述跟现代音韵学的理论和方法常常是格格不入的。

本书的总论部分可以看作是一部现代音韵学史。先师张世禄先生于1936年出版的《中国音韵学史》为一代名著,至今仍为世人广为引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先师只叙述到高本汉、马伯乐等出现为止。本书的叙述则是从高本汉、马伯乐等开始,而止于当代,因此本书是对先师《中国音韵学史》的继承和发展。本书的分论部分是对现代音韵学上重大专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其内容全部取自笔者十数年来的科研成果,其中有些内容曾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宣读、发表过,并获得学界的广泛注意和讨论。

本书叙述的许多内容,曾作为“音韵学研究”课程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和汉语专业本科生讲授过三次,反映普遍良好。笔者因此深受鼓舞,决定将这些内容汇成一书。乃于1989年9月

草成全书,而于今夏删削修订一过。因受印刷条件所限,书中国际音标多有删除或改用,许多汉字的谐声关系也未用繁体字来表明,造成了某些阅读上的不便,尚祈读者谅解;文中如有谬误之处,敬请海内方家教正。

杨剑桥

1993年9月

目 录

自序	(1)
一、总论	
第一章 汉语现代音韵学的诞生	(3)
第一节 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	(3)
第二节 汉语现代音韵学的诞生	(6)
第二章 《切韵》音系的研究	(10)
第一节 高本汉关于中古音系的构拟	(10)
第二节 《切韵》音系诸问题的讨论	(16)
j 化声母(17) 重组(19) 介音(21) 唇音字(23)	
重韵(24) 元音的数量(25) 纯四等韵有无 i	
介音(27) 《切韵》的性质(29) 其他(32)	
第三章 上古音的研究	(34)
第一节 高本汉关于上古音系的构拟	(34)
第二节 上古音系诸问题的讨论	(39)
谐声原则(40) 庄、章两组声母的来源(41) 群、	
匣母和喻三的关系(43) 清鼻音声母(44) 韵部	
分合(45) 主要元音的音值(49) 阴声韵的辅音	
韵尾(52) 其他(55)	
第三节 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	(57)
复辅音声母(59) 前缀(62) 介音(64)	
主要元音(65) 韵尾(66) 声调(67)	
第四章 近代音的研究	(70)
第一节 罗常培等关于近代音系的构拟	(70)
第二节 近代音系诸问题的讨论	(79)
中古知、照系声母的分合及其音值(79) 见系声母	
是一套还是两套(80) 影、幺、鱼、喻四母的分合	

和音值(82) 二等字 i 介音的产生(83) i、ɿ 韵母的产生(85) y 韵母的形成(87) ɤ 音的形成(88)
 《中原音韵》有无入声(90) 《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及其性质(95) 其他(99)

二、分论

第五章	《切韵》的性质及其音系基础 ·····	(105)
第一节	历史上的讨论 ·····	(105)
第二节	《切韵》是六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 ·····	(108)
第六章	中古汉语的重组问题 ·····	(115)
第一节	重组的发现和讨论 ·····	(115)
第二节	重组是中古汉语的客观存在 ·····	(120)
第三节	再论重组的音值 ·····	(128)
第七章	中古汉语的唇音字问题 ·····	(133)
第一节	钱大昕的功绩及其缺陷 ·····	(133)
第二节	轻、重唇音在上古的音类和音值 ·····	(135)
第三节	轻、重唇音的分化时代和条件 ·····	(139)
第四节	轻、重唇音分化的过程 ·····	(144)
第八章	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 ·····	(148)
第一节	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 ·····	(148)
第二节	带 r 复辅音声母的组合类型 ·····	(154)
第三节	带 r 复辅音声母的演变规律 ·····	(159)
第九章	中古舌齿音声母的上古来源 ·····	(168)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168)
第二节	跟舌根音谐声的舌齿音声母 ·····	(172)
第三节	跟唇音、鼻音谐声的舌齿音声母及其他 ·····	(178)
第十章	上古韵部的分合问题 ·····	(183)
第一节	古韵分部的怀疑 ·····	(183)
第二节	历史的回顾 ·····	(184)

第三节	从方法论看古韵部的分合	(186)
第十一章	上古汉语的声调	(198)
第一节	前人研究的回顾	(198)
第二节	上古声调的分布特征	(200)
第三节	韵文和谐声系统中的声调	(202)
第四节	上古去声的来源	(208)
第十二章	近代汉语的唇音合口问题	(214)
第一节	《中原音韵》唇音字的开合口	(214)
第二节	近代汉语唇音合口的来源	(220)
第三节	近代汉语唇音合口的消失及其他	(224)
参考文献		(227)

一、总论

第一章 汉语现代音韵学的诞生

第一节 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

汉语音韵学已经走过了一千好几百年的历程,这一漫长的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的”和“现代的”。传统的汉语音韵学是从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的双声叠韵和反切的发明开始,历经隋唐韵书、宋元字母等韵之学和明清的古音学,一直到朴学大师章炳麟、黄侃为止;现代的汉语音韵学是从汪荣宝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开始,历经第一代学者高本汉、马伯乐、西门华德,第二代学者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王力、陆志韦、董同龢等,一直发展到现在。这两个阶段虽然内容和性质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却都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发生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因印度佛教输入中国,梵文拼音原理随之输入而形成的,第二阶段则是因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随之传入而形成的。

远在明朝成化年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就开始派会士东来,试叩中国大门。只是因为当时明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禁严厉,耶稣会士不得其门而入。到了明朝万历八年(1580),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随葡萄牙商人到广州贸易,向两广总督贿赂,才得以在肇庆建立了一所教堂。三年后,罗氏又把利玛窦(Matteo Ricci)带来中国。利氏精通数学、汉语,畅晓中国六经子史,因此能结交名士,跻身儒林。他又买通宦官马堂,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到北京朝拜神宗皇帝,以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主图像、珍珠

十字架、三棱玻璃柱等上贡，甚得神宗欢心，在北京获得立足之地，建立教堂。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耶稣会士纷纷来中国传教布道。

推原耶稣会到中国传教布道的目的，一是为了寻找新地盘，争取新教徒，以恢复中世纪天主教的隆盛地位，二是作为欧洲各殖民帝国的先遣队，在中国进行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宣传。但是耶稣会士们要取得传教布道的方便，就要博取中国皇帝的青睐，中国人民的信任，于是他们积极参与朝廷修订历法、制造火炮、测绘地理等工作，并翻译出版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采矿冶金学、人体解剖生理学、地理学等等大量科学著作。同时，耶稣会士中不乏热爱中国、一心传教的正义之士。这样，跟耶稣会的本意相反，耶稣会士竟成了传播西方现代文明的使者。

耶稣会士为了在中国各地传教布道，调查中国各地的方言和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就成为他们的一项首要的工作。当时记载中国各地方音的著作如雨后春笋，其主要有玛的尔(Mateer)的《官话类编》(Mandarin Lessons)、卫三畏(S. W. Williams)的《中国音典》(Syllabic Dictionary)、美国长老会的《官音罗马字母标准拼音》(The Standard System of Mandarin Romanization)、爱特尔(E. J. Eitel)的《广东方音字典》(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1877)、雷氏(Ch. Rey)的《客家话中法字典》(Dictionaire Chinois-Francais dialecte Hacha, 1901)、麦考莱(R. S. Maclay)和鲍尔温(C. C. Baldwin)的《福州话拼音字典》(An Alphabeti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 1870)、道格拉斯(C. Douglas)的《厦门俗语中英字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Amoy, 1873)、戴维斯(D. H. Davis)和西尔斯拜(J. Silsby)的《上海俗语中英字典》(Shanghai Vernacular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1900)、赫墨林(K. Hemeling)的《南京官话》(The Nanking Kuanhua, 1907)、蒙哥马利(P. H. S. Mont-

gomery)的《温州方言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Wenchow Dialect, 1893)等等。这些记载中国方音的字典对于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实在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音字典大多采用罗马字来注音,使得中国语文的研究获得了能够精密分析音素的记音工具,较之其他拼音文字如梵文、藏文、满文等更为简明而细密。二、现代各地方音的调查和记录,使得中国古音的研究有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而对于古音音值的拟测尤其是珍贵的参照系数。

在耶稣会士中,对于中国音韵研究影响较为巨大的是利玛窦、郭居静(Lazane Cattaneo)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利玛窦著有《大西字母》,此书已佚,原貌不可得知,而他在《程氏墨苑》中有四篇用罗马字注音的文章^①,其中所用的声、韵、调方案与后来的《西儒耳目资》相似,由此可见两者的传承关系。郭居静著有《西字奇迹》,亦佚,内容可能与利氏之书相似。金尼阁作《西儒耳目资》(A Help to Western Scholars, 1625),这是一部帮助西洋人学习汉语、汉字的罗马字注音字汇。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译引首谱”是总论,第二编“列音韵谱”是从罗马字拼音查汉字,第三编“列边正谱”是从汉字查罗马字拼音。金尼阁的罗马字注音方案一共只用了25个字母(其中5个元音字母,20个辅音字母,另加5个声调符号),就可以拼出当时官话的全部音节,这种比反切容易得多的方法引起了当时的中国音韵学家的极大兴趣和注意。王徵评价《西儒耳目资》的万国音韵活图和中原音韵活图说,用这两张图来拼切,可以“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第举第二十五字,才一因重摩汤,而中国文字之源,西学记载之派,毕尽于此”(《西儒耳目资·序》)。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通

^① 这四篇文章是:《信而步海疑而即沈》、《二徒闻实即舍空虚》、《媚色秒气自速天火》、《述文赠幼博程子》。

雅》卷一)另一个音韵学家杨选杞,看到旧韵书的反切又难又拗,并且所用的反切上下字也没有一定,于是立意改革。当他看到《西儒耳目资》以后,“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同然集纪事》),于是有《声韵同然集》之作。可以说,此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轰轰烈烈的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以及高本汉、马伯乐等和广大中国学者对于汉语历史语音的大量讨论辨难,都是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东传之后的产物。在此基础上,注重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汉语现代音韵学的诞生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丰硕果实了。

第二节 汉语现代音韵学的诞生

清代著名古音学家段玉裁在其晚年曾写信给江有诰云:“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答江晋三论韵书》)这段话反映了传统音韵学在完成古音音类的归纳之后,已经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拟测古音音值的要求,这是汉语音韵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最早系统描写古音音值的大概是戴震,他的古音九类二十五部全部用零声母字标目,可见其用心。后来章炳麟也力图描写古音音值,在《二十三部音准》中对古音各部都列举了数十个汉字,作为古音音值的标准。但是戴、章两氏均以汉字标音,这样一不能显示构成汉语音节的音素,二不能使各方言区对于标音的汉字具有统一的读音,因此拟测工作实际上是失败了。

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俄国人钢和泰(A. Von Staël-Holstein)在《国学季刊》第一卷上发表了《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胡适译)。文章说:“研究各个时代的汉字如何读法,有三个重要的材料来源:第一,中国各种方言里与日本、安南、朝鲜文里汉字读音的比较研究。第二,古字典(如《唐韵》之类)里反切表示

汉字的读法,古韵表可以考见韵母的分类。第三,中国字在外国文里的译音,与外国字在中国文里的译音。”钢氏强调,最应该注意的是梵文的密咒(mantras)一类。密咒译音使那些不懂印度文的人也可以用汉字念诵,因此只要寻找出梵文原文,再把它和音译的咒语对照,便可以知道这些汉字在那时的实际读音。此文可说是用新材料、新方法研究汉语音韵的思想准备。同年,汪荣宝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指出:“近世学者据谐声偏旁及经典中有韵之文以考古韵,所得甚多;然偏旁及韵文之功用,至考见古今韵分部之异同而止。若古某部之当读某音,其与今读之差别如何,则虽遍稽旧籍,无由得确实之证明。……夫古之声音既不可得而闻,而文字又不足以相印证,则欲解此疑问者,惟有从他国之记音文字中求其与中国古语有关者而取为旁证而已。其法有二:一则就外国古来传述之中国语而观其切音之如何,一则就中国古来音译之外国语而反求原语之发音是也。”其研究的结论是:“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字亦皆读a音,不读u音或ü音也。”汪氏此文在材料上突破了汉字的束缚,在方法上摆脱了单纯的考证,在成果上推翻了顾炎武以来“古无麻韵”的旧说,^①为拟测古音音值开辟了新的大道。由于高本汉、马伯乐等人的研究在当时汉语音韵学界还没有发生重大影响,故汪氏此文实在成为汉语现代音韵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汪文发表以后,很快就遭到以章炳麟为代表的传统派的激烈反对,由此引起了关于古音研究的第一次大辩论。1924年章氏在

① 顾炎武《唐韵正》认为麻韵上古当一分为二,一部入鱼虞模,一部入歌戈;而其读音当为u、y。汉魏以降,西域音乐、佛典等传入,多用“迦、伽、沙、邪、吒”等麻韵字,并读如a,故以为麻韵a音来自西域。

《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①中云：“内典译音，自隋以上，皆略取相似，不求谐切。玄奘、窥基、义净之书，译音渐密，然亦尚有疏者，如宋明人书译金元音不能正确，盖不足为典要矣”；日译吴音、汉音，则“展转侏离，尽失古读，……或欲据此倒证中土唐音，甚谬”。徐震也撰写《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质疑》一文，认为语音随方域而转变，一字有本读，亦有转音，固不能整齐划一，以之迳译梵文，难以密合无间。对于传统派的错误观点，以汪荣宝、林语堂、唐钺为代表的现代派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汪氏《论阿字长短音答太炎》(1925)云：“当时名僧，大都兼精华梵，译音细事，岂有全体疏讹，毫无准率之理。其间或歧异，皆由古今音不同，吾人正可据以考见历代声韵流变之迹。”而其中尤以林氏为切中要害。林氏云：“倘是日译、高译、梵译及安南音，歌韵俱读 a，证据相符，我们总不能不承认 a 音为歌韵正读，非出于传讹的了。”(《再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这次古音学上的大辩论最后以现代派的胜利告终，从此，汉语音韵的研究在观点、材料、方法和目的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汉语音韵学终于以崭新的面貌走上了历史语言学的轨道。

当然，汪氏的文章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一、所依据的材料与所考证的古音的时代不合。汉译梵文、日译吴音当在魏晋六朝时，日译汉音当在隋唐时，据此不得确认先秦两汉古音的音值。二、对于译音材料的可靠性片面地绝对肯定。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音系统，音译往往是近似的；而且隋唐以前“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季羨林《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故即使承认歌戈两韵汪氏之说较确，但鱼虞

^① 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未明确谈及 a 音的长短，但汪氏曾向其弟汪旭初(汪东宝)谈及歌、戈、鱼、虞、模诸韵均当为 a 长音，因为梵文的长 a 是用上述诸韵之字对译的，汪旭初将此意见转述于章氏，章氏因作此文。

模韵在魏晋以上与歌戈韵截然有别,实不能混为一谈。

汪荣宝文章的发表,表明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从此获得了新观点、新材料和新方法,并进而完成了传统音韵学向现代音韵学的转变。这里所谓的新观点,是指传统音韵学作为经学的附庸,其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古代经典文字的形音义,主要工作是考订、解释和评注各种经学文献,故实质上属于语文学的范畴;而现代音韵学则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主要目的在于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研究汉语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从而把各种历史事实联成一个自然发展的演变过程,这一观点是全新的,实质上属于历史语言学范畴。这里所谓的新材料,是指传统音韵学所使用的材料局限于韵书、韵图、反切、韵文、谐声、异文、声训等等,其主要作用在于指示每一个汉字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语音系统中的音韵地位,即指明古音的音类;而现代音韵学所使用的材料除上述种种以外,又增添了现代汉语方言、中外译音、汉藏系诸语言等等,其主要作用不仅在于指示古音的音类,而且在于表明每一个汉字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读音,即表明古音的音值。这些新材料,使汉语音韵学有可能完成历史比较语言学所规定的任务——重建“母语”。这里所谓的新方法,是指传统音韵学主要注重材料的考订和归纳,例如《诗经》韵部的归纳,《切韵》反切上下字的系联等等,这种方法只能求得古音的音类,并且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现代音韵学则除了传统的方法以外,更注重生理解释、数理统计、历史比较和语言类型等方法,这些方法能够科学地解释各种语音现象,并替古音音类构拟具体的读音。音韵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就此而言,音韵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但是从语言本身的结构特点,特别是语音构造看,音韵学又必须采用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近百年来汉语音韵学能够在小学各部门的研究中遥遥领先,其方法之先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章 《切韵》音系的研究

第一节 高本汉关于中古音系的构拟

西方学者研究汉语音韵,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1809年,英人马士曼(Marshman)在印度塞伦普尔发表了《中国语的文字和声音》(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文,指出梵字母和宋人三十六字母的关系,又发现暹罗、缅甸、藏语和汉语在语音上的相近之处。只可惜他所假定的汉字古读,乃是根据《康熙字典》卷首的《字母切韵要法》猜测得来的,并不能算作古音的构拟。以后英籍牧师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上海先后出版了《中国上海土话文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1853)、《中国官话文法》(A Grammar of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Mandarin Dialect, 1857),证明汉语中古音有浊的塞音声母 b、d、g 等,跟清的塞音声母 p、t、k、p'、t'、k' 相对立,又有清的塞音韵尾 p、t、k,跟鼻音韵尾 m、n、ŋ 相对立。意大利人武尔披齐利(Z. Volpicelli)在上海出版《中国音韵学》(Chinese Phonology, 1896),根据广州、客家、温州、福州、宁波、北京、汉口、扬州、四川九种方言,和高丽、日本、安南译音,参照梵文定出中古三十六字母的音值,又根据中古各摄各等在现代方言中的种种读法,运用少数服从多数的统计办法,定出中古的元音。但武氏所取的方言材料很不可靠,笔误也不少,故结论难以令人置信。1900年,沙昂克(S.